

# 以 SRI 为例分析了导致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弱化的因素

李 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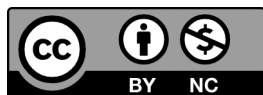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武汉

**摘 要** | 文章从水稻强化栽培体系在四川省 Y 村推广初期取得良好效果之后未能得到可持续应用的现象出发，以 SRI 为例分析了导致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弱化的因素及其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产生的不利影响。研究发现，推广主体权力的弱化和农户对知识体系的模糊性认识导致新型现代农业技术无法建构起有效的话语，而农民在考虑到技术“比较效益”之后选择的外出务工和“消遣经济”的道路，则进一步弱化了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同时，也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造成了严重影响。

**关键词** | 现代农业技术；话语；水稻强化栽培体系（SRI）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在工业高度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农业技术来武装农业，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受国家发展战略和思路的影响，政府、市场和学者加强了对现代农业技术的研究投入以及推广和应用，

作者简介：李豫，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

文章引用：李豫. 以 SRI 为例分析了导致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弱化的因素 [J]. 农业科学进展, 2021, 3 (3): 108–115.

<https://doi.org/10.35534/aas.0303014c>

并积极探索影响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因素，通过有针对性的解决来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现代农业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和推广已经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而这套知识体系则构建了一套话语，并受到了专家系统的支配，所谓的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与此同时，其推广也受到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左右。由此可见，现代农业技术话语通过和政治、经济权力的结合，构建并强化了现代农业技术话语权。也就是说，作为知识体系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影响、控制话语运作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权力又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两者是一种辨证的同构关系。因此，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必将对农户和农业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话语控制”。但是，现代农业技术话语是否也能为新型现代农业技术提供稳固而有效的话语权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出现了弱化现象呢？本文将以水稻强化栽培体系，以下简称“SRI”）在四川省 Y 村的推广和应用为例来进行分析。

## 2 研究介绍

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区域是位于成都市以东，隶属简阳市东溪镇的 Y 村，属于川中丘陵区，全村共 612 户。村庄属于典型的“空心村”，村中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外打工，现在村中的常住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和孩子，种植业收入和打工收入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村中拥有的耕地分为水田和旱地，水稻是当地的主要种植作物。由西方学者发现和进行研究，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提出的 SRI 通过康奈尔大学国际农业、粮食和发展研究的诺曼·阿布霍夫博士和非政府组织 ATS 在马达加斯加岛进行推广和应用之后被介绍到其他产稻国家，并建立了 SRI 国际协作网，1999 年以来东南亚等多个产稻国开始开展 SRI 试验示范。在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影响下，2001 年，四川省科技厅对 SRI 的研究给予了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组织成立了“四川省水稻强化栽培研究协作组”，以水稻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根据四川稻作区的生态条件和水稻生产实际，对 SRI 加以改进以实现其本土化。SRI 在四川进行本土化

研究后形成了“水稻覆膜节水综合高产技术”，此技术是以地膜覆盖为核心技术，且整合了水稻旱育秧技术、稻田少免耕技术、水稻精量推荐施肥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大三围强化栽培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综合集成创新技术，由于其插秧方式成三角形状，因此，又俗称“大三围”技术。

2010 年 4 月，实地调查发现，Y 村的大部分农户不再使用“大三围”技术中的大三围栽培方法和水稻覆膜方法，只有其中的分支技术——旱育秧技术得到了有效推广。由此可见，SRI 在初期推广取得明显效果后并没有像种子、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一样，得到可持续应用。由此可见，SRI 这套话语已经显示出来了一种明显的“弱化现象”。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地研究，通过长期的驻村观察，直接针对农户使用 SRI 的行为及其影响，在社区层面上进行系统综合分析，采用来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访谈对象为 SRI 用户、非用户及技术推广负责人），来研究导致出现“弱化现象”的因素及其对技术推广和应用造成的影响，争取得到较全面的结论。

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我们首先要从我国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历程来进行分析，以揭示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集体化时期，中国政府以其特有的权力成为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主体，现代农业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传播，农产品产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对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低价薄利”的价格政策，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末，各类化肥的供应价基本趋势是“稳中有降”，这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稳中有升”一样，曾被宣传为“党和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怀”。当时的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是依靠国家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进行的。总的来说，社会动员指主体对资源、人力和精神的发动，实现较为广泛的资源整合，它与现代化的过程或表现相联系。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动员传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力量对社会的不断渗透，集体动员型体制逐渐形成。社会动员作为国家安排社会秩序，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了早日实现现代化，国家发起了一系列政治动员活动，其中，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展的“大跃进”和“学大寨”等社会动员活动席卷了整个农业领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知识体系得到了有效的、广泛的传播，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

术在我国农村地区先后得到了有力的推广和应用。

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农业生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农民不得不通过大量增加生产资本的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现代农业技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是因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广和应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由于生产制度的变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进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黄宗智在对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市松江县农业发展的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他认为转向农业生产家庭责任制并未带来松江地区产量的显著上升,当地粮食产量在集体化生产的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就已经达到顶峰。指望仅仅把劳动力组织方式由集体化改为家庭经营就能使农业生产获得奇迹般的推动是不实际的。由于宣传部门对市场化的家庭农业的过分渲染,人们易于忽视全国范围的这一事实。全国与松江的差异不在其实质,而在时间上的先后。先进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较快从新的投入和技术突破中得到好处,而后进地区则较慢。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市场的主体——企业成为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主体,现代农业技术话语权也发生了位移,从政府的手中转移动到了企业的手中。另外,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维护和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不同的途径加快、加强现代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总之,随着现代农业技术话语主体——政府的退出,农民被彻底锁入了经济力量的无声控制之中,而市场的主体——企业则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已经建构起来的话语权,成功地完成了权力的交接,并在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专家系统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利用专家系统对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强化了已经获得的权力,实现了话语的稳定,进而对农民形成了更为强烈的控制作用。

### 3 农户对知识体系的模糊性认识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的弱化作用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SRI 的推广主体并没有构建起来稳定的话语并获得有力的话语权,这是导致其不能可持续推广和应用的重要原因。为了更深入地对新

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的弱化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假设,SRI 的推广主体具有稳定、有效的话语权。在此条件下,它是否能够得到可持续推广和应用呢?答案是否定的。粮食安全历来被世界各国政府所重视,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概念,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谋求“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点。但是,自 2000 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连续出现滑坡,我国的粮食安全一度出现危机,提高粮食生产部门的效率因而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SRI 以其高产、省工、节水等方面的优点逐渐进入决策者和普通农民的视野。目前,SRI 已在四川、黑龙江、浙江、湖南、广东等多个省份进行了试验、示范和推广。四川省简阳市东溪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袁勇等通过对东溪镇采用了水稻覆膜节水综合高产技术的农户调查显示,该技术正常年景可增产 20% 以上,干旱年景增产幅度则可达到 50% 以上。每亩还可节约用水 70% 左右,节约用工 10.4 个,减少现金投入 23 元,纯收入增加 280 元以上。在减少投入、用工和节约水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干旱年景稳产、正常年景增产,扭转了“小旱减产、大旱无收”的靠天吃饭的局面。但是,实地调查发现,Y 村农户所生产的稻米主要用于家庭内部消费,商品率几乎为零。因此,SRI 并不能为其带来直接的现金收入,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即使增加的这部分产量能够货币化,是否就能够满足农户的现实需求和增加农户对 SRI 的兴趣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需求层次比较低,当时,农业生产既能够满足农民对食物的需求,也可以换取一定量的货币,满足其对货币的基本需求。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城市人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同时也诱导了农民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而需求层次的提高需要更多货币的支持,因此,农民对货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强,但是,由于市场力量对农业生产利润的不断剥削,导致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进而降低了农民获取货币的能力。因此,虽然 SRI 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但是,增产毕竟是有限的,即使能够转化为货币,也是微乎其微的,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去采用这第 1 期徐晓鹏:新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困境的话语分析·145·项技术呢?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而推广新型现代农业技术只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罢了,

因为农民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失语的，他们的主体性丧失了，他们根本无法从中获取应得的利益，在此情况之下，必将严重影响他们采用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城乡收入比已经由 1978 年的 2.57 扩大到 2008 年的 3.34，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如果将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收入比甚至会更大，因此，农民“追随”城市人的需求将只能是望洋兴叹。这在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农户获取货币的压力，面对增产不增收的土地，他们无可奈何，这必将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弱，进而导致土地的资本价值逐步降低。实际上，土地已经由发展资本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生存资本，农民现在种地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口粮，农业已经变成了他们眼中的“副业”。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变化也将影响到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因为随着土地资本性质的变化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将严重影响农民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和对其的重视程度。

## 4 技术“比较效益”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的弱化作用

实地调查中，据 Y 村村主任也就是农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反映，SRI 在本村第 3、12 村民小组的推广效果比较好。但是，第 12 村民小组队长介绍：第一年，共有 7 个试点农户采用了此项技术；第二年，有一半多的农户使用该技术，这也是用户最多的时候，因为当时免费提供地膜，并提供价格较低种子，而且种的好，还会给予物质奖励；但是，第三年，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慢慢地，使用技术的农户就减少了；现在估计整个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户在使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大部分 SRI 的用户反映，使用该项技术之后，水稻的产量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实际的增产效果不如推广专家宣传的那么明显。总之，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 SRI 这套话语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最终导致该项技术不能得到可持续应用，也无法解决农户面临的现实困境。农民为了维持生计，提高生活水平，只能自谋生路，最终，在国家政策和现实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他们选择了外出务工，而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又是陌生

的，他们每走一步，都充满了风险。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铤而走险，以获取生活所需要的货币。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农民，面对农业生产的现实困境，也走上了“消遣经济”的道路。而农民所采取的这些策略性行动则进一步弱化了新型农业技术话语，彻底阻断了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和应用。

## 5 结语

本研究从 SRI 在四川省 Y 村推广初期取得良好的效果之后未能得到可持续应用的现象出发，以 SRI 为例分析了导致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弱化的因素及其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以及 SRI 的推广主体——专家系统和协会负责人因为缺乏稳定性的权力这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根本无法保证 SRI 得到有效推广和应用，进而无法建构起稳定的话语。另外，专家系统的准确性知识和农户的认识模糊性发生碰撞的时候，也会削弱该知识系统的传播有效性，知识体系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就不能形成有效的话语。总之，由于 SRI 这套话语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最终导致 SRI 不能可持续地推广和应用，也无法解决农户面临的现实困境。为了维持生计，提高生活水平，年轻的农民选择了外出务工，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农民则走上了“消遣经济”的道路，而农民所采取的这些策略性行动则进一步弱化了新型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彻底阻断了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 参考文献

- [1] 亨利·伯恩斯坦. 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J]. 汪淳玉, 叶敬忠,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8-99.
- [2] 哈丽丹·买买提, 等. 化肥污染的防治措施和方法探讨[J]. 新疆农业科学, 2005(42): 136-138.
- [3]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4.
- [4] 袁隆平. 水稻强化栽培体系[J]. 杂交水稻, 2001(4): 1-3.

## **SRI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Discourse of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Li Yu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rice intensive cultivation system had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romotion in Y village, Sichuan Province, but failed to be sustainedly applied, the paper took SRI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discourse of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its adverse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tudy found that to promote the main power weakening and farmers fuzzy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leads to new mod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cannot construct effective discourse, and the farmers “benefit” in considering the technology after the choic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way of “recreation economy”, further weaken the new mod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Key words:**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scourse; Rice Enhanced Culture System (SRI)